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

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

陈淳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

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

陈淳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 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陈淳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12

(马克思主义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第 19 辑)

ISBN 978-7-80678-810-3

I. 文… II. 陈… III. 国家起源-对比研究 IV. D0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3478 号

责任编辑 张玉贞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王小阳

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

——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

陈 淳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39.75

字 数 480 000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78-810-3/D·15

定 价 80.00 元

序 言

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是当代国际考古学界三大战略性研究课题,它们是提升考古学研究水准,使之从年代学、类型学研究上升到解决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重要基石。而这三大课题,在我国考古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尚未提到战略上应有地位,与国际考古学界研究尚存在较大差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国外研究的现状及其历史了解不够,难以同国际考古学界进行平等的全方位对话。本书主要就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问题,系统地介绍了国际考古学、历史学界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方法沿革、理论进展,将中国当前研究的状况和成果置于国际成功经验的大背景中加以比较和审视,说明其成就和差距之所在,对于推动我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相关研究,无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本书系统介绍了从西方早期思潮经摩尔根、马克思、新进化论到当代后现代思潮的发展历程,评述了自发论、水源论、战争论、贸易论等早期国家起源的主要理论,围绕着社会复杂化问题、酋邦问题、五大文明古国考古学考察的最新进展等作了重点阐述,涉及理论观念的介绍与梳理、探索领域的界定、技术手段的采用等众多方面,给中国考古学界相关研究特别是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一个相当全面而系统的参

照系,体现了本书作者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很深的修养。本书结合中国良渚文化去向研究对国际上早期文明崩溃问题研究的评述,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亮点。

中国考古学自产生之日起,就深深地与传统学术结合在一起,后来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又长时期走着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所以说,中国考古学的自身特点,既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又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但是,民族性不应该成为封闭性的理由,只有与世界学术界加强交流,才能够不断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考古学本身即是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产物。当然,不仅仅是考古学,近代整个学术体系和学科分类系统,实际上都受到了西方极大的影响。经过多年特殊环境下的封闭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与国际学术界长期隔绝的局面被打破之后,新的思潮、理论、方法和技术大量传入,给当时学术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反思和学习的结果,是迎来了90年代之后的飞速发展。今天中国考古学的局面与二十年前的局面相比,虽然在很多方面与国际学术界仍然有很大差距,但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学术研究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我们很多优秀学者既坚持民族立场,又虚心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为此,发展我们本民族的学术,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具有世界眼光。王国维曾经从“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的视角对中国学术史作过一段著名的总结,大意是说中国学术有三个重要时代:诸子学说光焰万丈的晚周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自六朝至唐宋,佛学入华,“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又因宋儒的调和中印思想,此一受动时代“又稍带能动性”;“至今日而第二佛教又见告矣:西洋思想是也。”这里,王国维将“西洋思想”对中国学术的影响放在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来考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甚

至与佛学相提并论,并预言中国学术将迎来一千多年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当然,在转化为国人皆若大旱而望云霓的“能动时代”之前,这首先是一个“受动时代”,至今日为止,这“受动时代”还远远没有结束,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既不必妄自菲薄,更不应该固步自封。

夏鼐先生曾在他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不仅是中国史学和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夏鼐先生生前曾十分关注中西文化史中的对外交流问题,彰显了这项研究本身也有加强对外交流的必要性。夏鼐先生还指出,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起源问题一样,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够保留下来,所以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佐证。苏秉琦先生也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提出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接轨的口号。他说世界史不能没有中国,但是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与现在的研究状况很不相称。中国历史传统就是天下国,现在需要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这就是“世界的中国考古学”和与世界接轨的“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提出。中国考古学需要在建立自己特色的基础上,为与世界接轨和与未来接轨、为自己在世界学界取得发言权和立足点打下基础。要不辜负这些先贤们的期望,需要我们在文明探源和学科发展上与国际加强交流、虚心学习、取长补短、推陈出新。

陈淳教授在我国考古学界,以最富国际视野及擅长理论思考和理论探究而知名,本书所征引的英文文献即达80种左右,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陈淳教授的这本书,视野开阔,富于理论性和学术性,是一部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成果并且以新的思路研究中国具体问题的代表

性力作,对于我们吸收西方学术思想的营养,借鉴国际同行的经验,当有重要价值,值得向读者郑重推荐。

姜义华

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〇〇七年元月十六日

前 言

对于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兴趣和我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专业方向似乎没有关系,写这类文章在研究范畴划分细致和分工比较明确的中国考古学界可能会被看作是一种异类的举动,但这并不妨碍我从相同的理路来看待这项研究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在考古学领域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常被认为是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因为其研究的对象、理论和方法具有世界的共性,比如全世界的更新世社会都是狩猎采集经济的平等社会、工具都是打制石器以及少量骨器,需要第四纪地质学、古脊椎动物学和古人类学的知识背景,并且在研究石器技术和工具的方法上都具有很大的共性。所以,世界各国搞旧石器考古的学者在交流上不会有太大概念、方法和对象方面的障碍。然而,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考古学似乎逐渐变为地区性和民族性很强的研究领域,特别进入历史时期和文字出现之后,考古学研究逐渐变为国家、民族、地区等涵盖范围和研究对象很窄的专题和个案,研究课题的特殊性变强、共性和一般性特点变少,学者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比较困难,比如中国的商周和秦汉考古和埃及的王朝考古等等,这些领域几乎等同于各国本身历史的个案研究。

偏离自己的专业领域,想从世界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研究的跨文

化比较来讨论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最早还得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1987 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约翰·奥尔森博士(J. W. Olsen)在英国的 *Antiquity*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今天中国考古学的实践”的文章。奥尔森的中文名字叫欧阳志山,研究中国的旧石器考古学,因当年经常访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而与他相熟。他在那篇文章里指出中国考古学存在的两大问题使我印象深刻,一是中国考古学只关心类型学和年代学而忽视了对考古现象根本原因的探究;二是中国考古学缺乏以解决某些重大社会历史问题为目标的战略性研究,而这方面的研究是国际考古学研究的基石^[1]。他所提到的这些战略性目标就是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三大探索课题。

奥尔森的批评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因为我很想了解中国考古学和国际学界的在这些课题上的研究究竟有哪些不同,差异究竟有多大。尽管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学界在这三个战略性课题上的投入都有所加强,但是就我自己所知的旧石器研究领域存在的明显差距来看,其他领域的差距应该也是存在的。这种想法使我在国外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之后,开始研读农业起源和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方面的文章,了解当今国际学界的进展和中国在这些方面存在的差距。

在大量阅读了欧美这些研究领域的文章之后,对照我所了解的中国同行的工作,慢慢察觉到其中的问题。当时作为局外人的好奇后来逐渐开始有一种想介入其中的冲动,特别回国以后,在我国学界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日益升温的情况下,我觉得从我自己所了解的知识背景出发应该为这项重要探索尽一点绵薄之力。首先,我国学界重视这项战略性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和突破,其次,对这类战略性课题的重视必然会推动理论和方法的提高和完善,并重视和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从而带动研究水平的整体提高。中国学界与西方学界过长的历史

和学术睽隔,迫切需要及时的沟通,超越意识形态、历史和民族偏见来思考和研究这个全世界关注的战略性课题。

在阅读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的论文并进行比较时,常常会被许多理论、思维、方法和研究问题的显著差异所困惑,这些差异引起了我的深思。西方学者那种缜密和逻辑性很强的论证以及抽象思维的重要性,在中国学者偏重经验和实证的思维中不能说完全缺失,但是至少是非常薄弱的。中国学者的论述常常满足于就事论事或凭借个人的常识性判断,很少将现象和个案上升到抽象的概念和逻辑推理来分析不可直观的深层原因,很少看到鞭辟入里的理论探讨和分析。由于缺乏类似西方学界那种长期积累和共同遵循的理论体系、概念和术语,使得中国学者大量论述只能被视为个人观点的陈述,无法从整体上或从理论的高度提升或增进人们对一些共同问题的认识。这种差异也使得中外同行在交流上缺乏沟通的共同语言。这使我觉得必须对认识论的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重视研究的科学性问题。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指出,科学和思想应该区分开来。科学语言是对因果逻辑的求证,对真理的反省和追求。思想只是个人见解的表述。在自然科学中,科学研究一般是在学界所公认的范例框架内来进行的,但是人文科学研究所表现的自我反省、自我认识和自我觉悟的特点,造成研究过程中无论是提问还是解释都可以混入自我。再由于人文科学规范和实验手段比较有限,加上大学里的文科教育一般缺乏哲学科学和方法论训练,使得学术研究随意性较大,以至于把学术和思想混为一谈,甚至可以把投机取巧、道听途说、一厢情愿、中伤他人或陈词滥调写成文章,难以达到厘清现象、分析因果、设计对策、解决问题的科学目的^[2]。

对于借鉴国外理论方法的问题,由于对当代国际社会科学成功经验和历史沿革缺乏全盘了解,我国一些学者便以为,除了马克思、恩格

斯在 19 世纪提出的理论仍放之四海而皆准外,当今国外的那套东西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正是因为没有一套基于成熟理论体系所确立的语汇和衡量尺度,使得我国学界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自己也很难达成共识,更不要说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了。因此,就我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中出现的与欧美学界之间的差异,可能不只是中西学术定位或导向之间的差异,还应该有根深蒂固的原因。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和知识结构被认为缺乏抽象和逻辑思维的元素,这些元素的缺乏导致中国虽然有骄人的四大发明,却没有孕育自然科学的土壤。这也许可以说明一些自然科学乃至考古学只能在近代由西方传入的原因。这种思维元素的缺乏作为传统文化的因子经过代代传承,在当代的中国学者中仍然显现无疑,成为根深蒂固的一种表现,其中理论在考古学中没有什么地位就是显著一例。这种表现结合意识形态和民族与传统文化的烙印,也在我们的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工程中反映出来。有些人会说,现在我国各个领域和国际接轨很快,在科学研究上也努力赶上国际潮流,怎么会在文明探源中存在这种问题呢。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在谈到文化传播问题时曾谈到,那些对生存起直接影响意识和技术特别容易传播,而在习俗和品味方面的文化特点往往比较保守。所以,中国在经济、军事和各项现代技术的发展上接受新事物基本没有任何障碍,但是涉及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可能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国考古界对欧美新考古学的态度和反应,以及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工程所表现出来的编年史导向便是明显的例子。

但是,一些研究思维完全从传统文化角度来评判也许并不完整。比如,唯物史观就是西方哲学思维的概念,并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于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元对立成为我们常提的思维方式之一,大家口口声声倡导唯物论,批判唯心论。于是大家以为,只要尊重

事实,以材料说话,研究的结果必定就是科学和客观的。但是,在仔细审视了西方的 idealism 的思维之后,发现两者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完全对立和水火不容。因为在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尊重客观事实固然重要,认识自己认识和观察能力的局限性和社会价值观的偏颇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同样重要。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对疑古思潮的认识,对古史中的传说和伪造成分进行辨析和剔除可能会缩短以前传说的文明史,这在学术上是严谨和必须的,但是从政治意义和民族自豪感上来说是大家不愿看到的。那么,如果文明探源研究是在为了增强民族自信心而努力拉长源头这种动力驱策下进行的话,不管采用的材料和分析方法何等唯物和客观,对这些材料的解释却是在研究者先入之见甚至社会压力的驱动下进行的,那么这种指导思想下的研究和结论能算是唯物史观的体现吗?所以,审视个人、社会和时代思潮和研究水平对认识客观世界的局限也是非常重要的。以考虑研究对象客观性为目标的唯物论思考,与审视研究者阐释中体现其个人偏见和价值观的唯心论思考恐怕都是不可或缺的。认识学者自身研究能力和局限性对科学研究的影响与认识研究对象的方法是否全面客观几乎同等重要。中国学者一般不太注意在研究中审视和反思自己价值观、研究能力和社会环境对自己研究的制约和影响,这也是中西学术传统中的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中国的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对文献记载的历史钟爱有加,似乎觉得只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才是真正的文明史,具有特殊的价值。于是,对于疑古辨伪总是觉得有点不自在,对似是而非的历史传说和记载难以割爱。中华文明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它比文献记载的内容来得更丰富和更悠久,它也不会因辨伪的梳理而缩短,也不可能因为当代学者的努力而被人为拉长。其实,文献记载留给我们的古代史是残缺不全和漫漶不清的描述,需要梳理和辨析。结合文献梳理和考古学的帮助

能超越编年学的范畴来全面重建古代史,并能追溯和延伸文献记载之前的远古文明。然而,中国学界似乎将考古学的作用定义在狭窄的史学范畴内,认为它的特点就是要和古文献研究和古史重建相结合,发掘出来的东西要用文献来说明才有价值^[3]。正如研究两河流域和墨西哥文明的资深美国考古学家、*The Evolution of Urban Society* 一书的作者罗伯特·亚当斯(R. McC. Adams)所指出的,文献资料作为社会机构和事件的标识对于我们分辨其分布和特点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早期文明和国家的文字记载一般局限于贵族的观点和活动,几乎很少提供社会信息,更不用说生态的过程和背景了。根据文献来进行通则性的总结几乎和考古学一样艰巨^[4]。

因此,我觉得就像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一样,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的理论和方法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这种探究的共性和价值并不因为各文明古国的物质文化差异和历史发展轨迹不同而受到影响和削弱,也不会因为中国有丰富和古老的典籍而没有学习和借鉴的必要。因为在这个战略性课题的探索上,世界各个文明古国探源在理论、方法和具体分析技术上都有相通的地方。这就是要探究社会复杂化的轨迹和驱动力,了解文明社会的因素诸如等级、阶级、权力、人口、城市、奢侈品以及集中管理机制是如何出现和发展的。虽然我们目前所见各文明古国的物质文化表现迥异,但是这些文化特征却是相似复杂化进程的反映和表征。换言之,是相似的社会文化动力和进程塑造了不同的物质文化症状,而从这些文化特征来探究文明和国家起源的动力正是这项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最近,我国学界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比如李伯谦指出,现在是开放的时代,是与国际接轨的时代,我们需要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理论方法与研究成果。文明起源是世界性的学术课题,不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就难以开拓我们的思路,也难以取得国际

学界认可的成果^[5]。王巍也提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需要探讨其背景、契机和演进规律,开展多学科联合攻关,系统地、深入地、全面地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背景、过程和机制,并提出了中国文明探源的12项主课题:(1)五帝时期的文化与社会;(2)汉字的起源与古代文明的关系;(3)环境变迁与文明的演进;(4)农业、畜牧业起源和发展与文明起源的关系;(5)手工业发展与文明的演进;(6)城市的起源、发展与文明的演进;(7)战争与文明起源、王权形成的关系;(8)宗教信仰与文明起源的关系;(9)各地文化交流与文明起源的关系;(10)中原三代王朝与周边社会文化的关系;(11)中国古代文明与其他文明古国的比较;(12)华夏民族起源与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研究^[6]。徐良高借鉴了欧美文明探源理论之后认为,中国文明探源应该对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形成机制和过程予以足够的重视。在田野工作中重视从聚落形态来探究社会演变,注意分析生存资源、城市结构、人口结构、手工业专业化,并重视跨文化研究来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7]。徐建新则指出,国家起源研究除了要搞清历史事实外,还必须回答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比如,前国家社会向国家演进的原因是什么?特定国家起源的特定因素是什么?不同地区国家起源过程是否具有普遍性?国家起源的原因是单一还是多重的?前国家社会向国家演进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途径?这种途径是单线还是多歧的?如何根据国家的社会结构进行类型的划分?^[8]上面列举的这些课题和问题已触及当代国际学界文明探源的要点,涵盖了我国文明和早期国家研究最重要的目标,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如何来达到和完成它们。

水涛指出,今天的中国考古学已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新时代,表现为对现有理论的怀疑、求证和完善,对新方法的采用和创新,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和追寻。我们已不能再满足于器物类型学为主的原有模式,要将整体系统研究、人地关系、技术实验和人类精神世界的研究尽

快提上议事日程。谁能首先了解和采用最新的科学方法,谁就将在研究中取得主动。只有理论方法上的多样化,才能给 21 世纪中国考古学注入新的活力,带来新的繁荣^[9]。

为此,我觉得中国的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应该跳出本民族的视野,立足于世界文明探源的立场来为我们这项研究定位。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超越文献和编年学的范畴来探究文明起源的社会复杂化过程。以文献为基础的史学研究和考古学研究是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他们的目标相同,但是研究材料和方法差异很大。即便是王国维“两重证据法”提到的地下之材,也仅仅是指出土的文字资料,而大量的物质文化所能提供的信息是区区文字资料所无法比拟的。因此,重建远古文明史需要更多依赖考古学的探究。其他文明古国由于文献资料不如中国丰富,所以考古学家们努力发展各种方法来从考古资料中独立提取信息。中国有丰富的文献资料,这是我们的福气和有利条件。但是,文献和考古研究应该作为积极反馈的两个独立研究领域来进行操作,时至今日,不能将考古看作是史学的附庸,有文献记载应该可以使我们的探源工作做得更好更细致。不然,从文献出发进行研究会极大地限制考古学的视野和它的探究潜力。考古学最大的优势在于能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乃至社会结构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原始社会在长时段中的历时演变,并梳理影响社会文化复杂化的各种因素,如环境、人口、技术、经济等与文明演变至关重要的变量以及所起的作用。只有深入了解这些变量互动和文明发展的进程和轨迹,我们才能真正达到重建中华文明起源的任务。

本书的目的就是想从世界性的视野来对国际学界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做一回顾和比较,内容侧重于思潮和理论的发展、社会复杂化研究的概念、范畴和现状、酋邦和早期国家的民族学及考古学研究具体案例的介绍。通过这个比较,可以为我国学界提供一个参照和镜

鉴,了解国际同行思考的问题、探索的领域、入手的方法和研究的成果。这对于提高我们自身的研究能力,促进我们的研究水平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因此,本书的副标题虽然叫做“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但限于篇幅,主要侧重对国外材料的介绍,国内一些成果在比较中约略加以介绍。国内的成果综述可参考朱乃诚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以及由他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前一本书是对 1928 年到 2000 年研究成果及 2001 年到 2004 年部分成果的概述,由千余本专著与论文汇总而成。而后一本书则将散见于 20 世纪出版的 150 多种期刊、70 多部论文和专著上的研究成果加以摘编,综合为一部反映中国文明探源历程与现状的专题工具书。正如朱乃诚在其著作的“前言”中所提到的,数十年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不仅成果众多,而且涉及面极广、背景复杂、头绪繁多,要根据发表的材料阐明中国文明起源的历程谈何容易^[10]。对国外成果的介绍也是如此,而且要比国内材料的介绍更加困难,难免挂一漏万。因此,本书只能被看作是一种非常简要的介绍和比较,如有欠缺和不足之处,望大家谅解。

本书共分为 7 章,第一章首先讨论认识论的问题。我觉得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上不同的看法常常被看作是处理研究对象不同的原因,其实我认为认识论的差异不容忽视,这个问题牵涉到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和学者受训背景和研究能力等主观方面的因素。所以,深刻认识自身思维方式对科学研究的影响实在是十分必要。第二章介绍学术思潮和理论,从西方早期思潮、经摩尔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进化理论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新进化论、再到后现代思潮,全面介绍了科学思维的历史发展轨迹。其中,美国新进化论的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的概念和进化模式被全世界的学者所采用、讨论改进。而我国的学者对科学思潮比较隔膜,因此介绍国际学术发展的历史潮流对于我国

的学界应该是很有帮助的。第三章介绍有关早期国家起源的主要理论,比如自发论、水源论、战争论、贸易论等等。对于这些理论的了解,可以看出我国学界和西方学界在早期国家探源中存在的差距,在从编史学角度来重建三代文明的过程中,是否也要从其他角度探究早期国家产生的原因?第四章介绍社会复杂化的研究。对社会复杂化的概念和定义进行了一番梳理后,本章对社会复杂化的各个特点和研究范畴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像生态环境、人口、聚落形态、城市、权力、手工业专门化以及宗教信仰等都是文明探源非常重要的课题和内容,如何来分析这些因素,是我们研究迫切需要加强的方面,而国际学界的成功经验是可供借鉴的他山之石。第五章是介绍酋邦的民族学观察和考古学研究,酋邦是前国家的复杂社会,被看作是古代文明的曙光。酋邦概念在引入中国后,虽然讨论热烈,但是尚未被学界完全接受。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国际学界流行的概念不适用于中国,他们较为钟爱古国、邦国、方国或万邦万国等古代文献中的称呼。其实,酋邦和部落、部落联盟一样是一种人类学术语和分析概念,只是它们出现较晚。我们用惯了19世纪摩尔根和马克思的术语,加上受意识形态影响,对20世纪西方学界出现的新术语比较陌生,感到难以接受。其实,这种科学术语的应用就如世界各国都采用西历一样,为我们观察和研究社会演变提供了一种国际统一尺度。中国过去传统上采用朝代、干支和阴历纪年,我们可以说以耶稣诞辰为起始的西历不适用于中国。但是世界各国都采用西历,中国后来也采用西历不但在科学研究而且在生活上可以带来很多方便。同样,采用国际统一术语也是为了研究和交流上的方便,是与国际学界进行沟通交流的基本前提。况且,先秦文献中的“国”与“邦”意思一致,“国”与“邑”能互训,“方”与“国”也同义。早期文献中的国与邦、邑、氏、族、姓在许多方面含义一致或相近^[1]。因此,采用古代文献中的术语来讨论当代社会科学问题容易出现定义